

陈晓明文集

德里达的底线

陈晓明  
著

SEM  
南方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陈晓明文集

德里达的底线

陈晓明 著

SEM  
南方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德里达的底线 / 陈晓明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3. 1

(陈晓明文集)

ISBN 978-7-218-15810-5

I. ①德… II. ①陈… III. ①德里达, J. (1930—  
2004) —思想评论—文集 IV. ①B565.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102947 号

DELIDA DE DIXIAN

## 德里达的底线

陈晓明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选题策划: 萧宿荣 段 洁

责任编辑: 肖风华 李力夫 肖 方 马妮璐

责任技编: 吴彦斌 周星奎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99)

电 话: (020) 85716809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289585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东鹏腾宇文化创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8 字 数: 583 千

版 次: 202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57168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7716172

## 序

《德里达的底线》出版于2009年，那一年同时还有《中国当代文学新潮》出版，两本书各自都有60万字。那一年我50岁，自己很看重这两本书，算是年过半百时的代表作，至今还是这样看。《德里达的底线》虽然没有做任何宣传和出版推广，短时间内第一版就售罄，一直想修订再版，无奈没有时间坐下来重读德里达。考虑到篇幅已经有60万字，再增加篇幅对于出版是个压力。想想也只有放下。此次收入文集除了纠正几个错别字，没有再做修改。虽然遗憾，但也是无奈之举。

本书出版后都只是朋友们私下交流，我从未组织过关于我的书的任何评论，这本书也一样。倒是《文艺研究》出面请南京大学肖锦龙教授写有书评，书评出来我才知道。想来一是可能是时任主编方宁先生重视拙著；二是时任副主编陈剑澜先生一直喜好德里达，他对我一直鼓励有加。是故请专家来写书评。《文艺研究》的书评主要是对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进行学术分析评价，有问题和错误直言不讳。肖锦龙先生的书评很认真，他在德里达研究方面用功多年，学问功力深厚，他在积极评价拙著的同时，也提出了很有学术深度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书评或这样的文学批评是我所尊重并信服的。可惜此番修订没有时间按照肖锦龙教授的批评建议进行深入修改，但我知道拙著还存在的诸多问题。

本书的体例构架虽然在来北大工作前就基本搭建好，但我到北大开设“德里达导读”（当时的课名可能是“解构主义理论导读”）课程时才真正形

成，记忆中开了两三轮。我与学生选择德里达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或其中的篇章细读分析，让学生读明白德里达的那些基本思想、概念、方法和价值立场。这门课显然比较需要用心费力，我在北大中文系有几门课都属于理论课，除了德里达外，“现代性理论导读”和“中外文学批评方法”都需要学生参与讨论，要自己做功课。不过，那些年这几门课都要限制人数（因为是讨论课），最后抽签确定选中课的同学，彼时想读理论的同学还是不在少数。

德里达晚期的思想更为深邃平和，他谈论的主题包括友爱、信仰、礼物、好客、馈赠、死亡等等，无不带有德里达独特的深度和个性化的魅力。德里达的好友，拉库-拉巴特说，保罗·策兰发明了诗，德里达发明了散文。拉库-拉巴特这里说的是“发明”，不是“发现”。可见拉库-拉巴特是在独创性和唯一性的意义上来说德里达的写作的，他的思想，他的言说，他的文体，他用文字构成的文本。他总是把你牵引到思想异域，完全神奇陌生的国度，总有来自外星系的几缕光不时透进来。本来确实应该把这些思想、主题和言说概括起来，或解读或分析或阐释，那一定是极有意思当然也是极有难度和挑战性的工作。想来自己对德里达晚近的著作已经无力深究。回想当年写作德里达这本书时，就耗尽了我的体力和精神。那时自己正当盛年，但上有老下有小。儿子那时正处于极端叛逆期，中考、高考，足以让我身心交瘁。母亲那时也时常病重病危，每接到妹妹的电话，我就要买上飞机票，飞往武夷山。那时每日只有一趟航班，飞机正常应该晚上九十点到达，但晚点是经常的事情。下了飞机还要坐上汽车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我的家乡光泽县城。夜里在山路上颠簸，一路接听妹妹的电话，心里万分焦急。有几年每年都有几次这样的情况发生。母亲最后活到82岁高寿才仙逝，以她那样的身体状况，她无疑是有着惊人的毅力。尽管很遗憾，自己没有照顾好母亲，全靠我姐姐和妹妹，最后母亲能活过80岁，我还是很欣慰的。就是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同时在写着《德里达的底线》，这仿佛是另一个国度里的事情。在这个国度里，我同样要历经艰辛困苦，要弄懂德里达一篇文章，一段话，甚至一句话，经常要花费半天的时间，要对读很多资料，反复琢磨上下文。那时自己还保持着一种工作能力，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坐在电脑前进入写作，进入思想的复杂维度里，可以迅速

抛却烦恼和羁绊。坐在电脑前写作自己喜欢写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快乐。但是，现在要我回到德里达，却是心有余力不足。盛年不再，要攀爬理论的高峰已经没有那样的心气了，诚如我在初版序言里说的，只能期待更年轻一代的学者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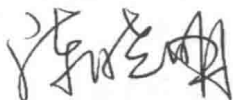
本书出版后于2011年获北京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或许是该书出版后最早获得的一项肯定，我很看重这项肯定。北大的优秀成果奖应该是最客观的奖项，没有人去活动、打电话、拜票之类。各个学科，各院系报上来的有近200种著作，都是各院系评选出来再到学校层面，应该说是北大成果中优中选优。那年《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获得北京市优秀成果奖，去领奖的路上，社科部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德里达的底线》在北大优秀成果奖评选中，得票居第一。因为这是事后，已经过去一段时间告诉我，也不算违例，这让我很受安慰。《德里达的底线》是我最看重的一部书，学术分量我自己不敢妄评，但我自己知道其难度和困苦，凝聚我的辛劳最多。能在北大获得不同专业背景的评委先生的肯定，不是容易的事情。在感激评委先生的同时，我也有一种欣慰之感。

这本书绝没有“好评如潮”之类——正如我对其他书一样，我从来不组织什么书评之类，连我的学生我都从未请他们写我的书评，都只是朋友们私下的鼓励。除了肖锦龙先生的书评外，倒是夏可君先生读后写有书评，对我有诸多鼓励。另外有些朋友表示读后的嘉许，王德威先生读后就有发来邮件，开始我以为是朋友间的客套或鼓励，后来又有两三次当面表示诸多肯定和鼓励。德威先生说：“中国人能把德里达写到这地步……”云云，我理解他还是真的很肯定这本书。德威先生早年翻译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柯和德里达的影响。他身边的同事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先生就对德里达崇敬有加，曾自诩“解构的历史主义者”。我与鲁枢元先生有次在一个评审会上相遇，枢元先生也特地和我谈起他读到《德里达的底线》颇有受益。枢元先生当是师长辈，非常客气地拉我到他的房间谈起拙著。后来他送我《陶渊明的幽灵》，非常用心写的一本功力深厚的著作。令我特别惊异和感动的还有范曾先生，他以80多岁高龄还阅读《德里达的底线》，一页一页读，还写有许多眉批，请他的弟子拍照来与我交流。我知道范先生认真阅读过黑格尔的多部著作，下过一

番功夫。作为晚辈的我，当然是敬佩范先生的求知精神，他愿意在拙著上花时间，也表明他对后现代知识的渴求了解的心愿——他一直在批评后现代，但他想更进一步了解后现代的诸多理论，对我也是极大的激励和嘉许。还有一些朋友、学生，乃至前辈师长读这本书都和我有颇多交流，我也深受感动，也算一本用心费力的书没有白写，还是有人读，对他人有所助益，我以为这是对拙著的真正的肯定，这也算是一种最为真实的慰藉。

回首往昔，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事情，但在那样困难的时间里写完《德里达的底线》，总算有一点聊以自慰的资本。年轻时敢于挑战难度，永不言败，总想一步步前进。二十年前，我在桌旁的墙上写了里尔克的一句话：“去珍惜重大的任务，并努力学会与重大事物交往。”写作这本书，也算是一项命定的“重大的任务”吧？于是，也可以心安理得看待自己的盛年岁月。

是以为序。



2020年12月4日

## 导 言

### 后现代的开启与解构的未来面向

2004年10月9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去世意味着法兰西最后一位大师、思想界最后一位大师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如此说法，在今天无疑会招致非议的，但若干年之后，我们可能会更深切地体会德里达给我们留下的那些警世预言般的哲思的深远意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这些理论术语今天已经不再新奇，已经构成当代学术话语的常规资源，特别是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似乎另一个学术时代正在开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批评理论的黄金时代就像梦境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sup>①</sup>，仿佛这样的历史不曾发生。当代理论和学术场域可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替代式的变迁被健忘症所支配，新兴的理论总是更具有蛊惑人心的力量，想当年美国“耶鲁四君子”的阵势，那真是气吞万里如虎。80年代，德曼英年早逝，哈特曼从一开始就一直若即若离，只有米勒仍在那里硬撑残局，更要命的是，布鲁姆还要改换门庭，杀一个回马枪。90年代初，那本影响巨大的《西方正典》，居然把解构主义也划到“憎恨学派”中去，这就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当然，布鲁姆并未把

---

<sup>①</sup> 米歇尔写过一篇文章《论批评的黄金时代》，指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后结构主义影响下所建立起来的批评盛况。参见W. J. T. 米歇尔：《论批评的黄金时代》，杨国斌译，《外国文艺》1989年第2期。

矛头直接或主要地指向解构主义，他或许是“怨恨”现在的批评理论把解构主义用得过于模式化，变成了身份政治、种族政治和差异政治的工具。从某方面来说，这无疑是对解构主义精髓的庸俗化；从另一方面来说，解构主义已经如此不可或缺地成为当代批评理论的基础，既提供思维方式，也提供术语和概念，总而言之，没有解构主义建立的平台，当代批评理论寸步难行。

解构主义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批评方法，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一个时代的观念、看待世界和事物的哲学立场。6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思想家，不管是福柯、拉康、巴塔耶，还是德勒兹、鲍德里亚、布尔迪厄……他们都经常与德里达相提并论，都被放在后结构主义或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中来理解并被运用。实际上，德里达给这个时代的知识创造提供的思想资源要基础得多，要更深远和更具有启示意义。人们在抱怨德里达晦涩的同时，却可以从他的思想中获取超额的思想启示和无穷的思想动力，这可能是20世纪以来最为奇特的思想景观。除了把德里达理解为一个世纪的启示录式的思想家、一个时代转折的预言家外，没有别的解释可以自圆其说。

2001年，就在德里达辞世前三年，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卢迪内斯库在与德里达对话时评价德里达说：

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您是这些丰富的精神遗产的最后一个继承人，我敢说您是这批思想家中唯一健在的人……但您通过对他们著作的解构，使他们获得了新生，使他们能够重新与人们对话，但大家不再把他们当成偶像，而是当成活的思想载体来看待。

另外，因为您是一个既忠诚又不忠诚的继承者，所以，您在当今知识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相当于过去的左拉和近代的萨特的地位。您的言论和著作（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以一种崭新的叛逆形式传遍全世界。我想对您说，您是个胜利者。

我的感觉是，当今世界与您的观念很相似。您对世界进行了解构，从分析问题的角度讲，这个世界变成了德里达式的世界。它如同

镜子里的影子，它的任何变化都躲不过您的眼睛。<sup>①</sup>

这里所说的“这批思想家”，即是指前面提到的“60年代”那批思想家。尽管德里达本人出于谦逊并不同意卢迪内斯库的这种说法，他认为不能过分夸大了他的成绩，也不认为自己真的有这么重要，但卢迪内斯库的说法并不是因为当面对话而表达的溢美之词，不少德里达的追随者都会认同。20世纪后期以来，没有哪一个思想家比德里达更具影响力，更具有改变当代思想立场和思想方法的能量。当今世界与德里达的观念很相似，这对于德里达来说，不知是值得庆幸还是悲哀，这就需要我们加以深入探讨。

因此，在今天，回到德里达，回到德里达的文本，就不是一项纯粹怀旧的祭悼仪式，而是清理当下、面向未来的必要之举。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项债务。当代思想亏欠德里达的太多，当代思想在德里达那里获取那么多的资源，却并未真正认真地理解他的思想（这也是德里达至死都在抱怨的事）。更为致命的是，对德里达解构理论的阐释，从来都是概括式的，或提纲挈领式的，很少有人回到文本去追踪、跟随德里达的思路，看看德里达的解构到底是如何运作的<sup>②</sup>，而本书的努力正是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德里达的思想无疑深奥怪异，其思想的深远意义和博大精深，在今天看来越发清晰。尽管如此，在德里达去世时，就其讣告仍然引起了一场风波。<sup>③</sup> 2004年10月10日，德里达去世第二天，《纽约时报》据说在第一

① 德里达等：《明天会怎样：雅克·德里达与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对话录》，苏旭译，中信出版社，2002，第3-4页。（Jacques Derrida, and Elisabeth Roudinesco, *For What Tomorrow: A Dialogue*, trans. Jeff Fort, Cali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2004, pp.2-3.）

② 2004年，本人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解构主义理论导读”课程，关于解构主义，硕士、博士研究生都可以说出一些概念和基本观念，但面对德里达的文本却依然感到阅读的困难。尽管说这里面可能有些来自中文翻译资料的问题，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并未认真阅读德里达原作，并不只有面对原作，才能明白解构并不是一堆观念、概念和术语，而是阅读文本才能够发现文本自行的解构，解构就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文本中。解构不是一套外在的可供随意套用的概念术语，而是可以在细读文本时发现和呈现的东西。这也促使我在写作这本关于德里达的书时，回到德里达的文本中去解读和追踪他的思路是如何展开的，那些解构是如何发生的，那些难点又要如何解开。

③ 参见尚杰：《德里达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关于10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德里达逝世讣告的风波》，《世界哲学》2005年第1期。

时间刊登了长篇幅的讣告，这篇由资深记者坎德尔（Kandell）写的讣告对德里达的一生进行了轻佻的概括。讣告声称，德里达的解构方法，就是肯定“所有书写都充满了混乱和矛盾，作者的意向没有能力克服语言本身具有的内在矛盾，要使各种文本——无论是文学的、历史的还是哲学的文本——从充满真理的绝对意义和永恒性中解脱出来”。这就是说，德里达把整个艺术以及人类所有的思维活动都看成是矛盾和混乱的，而人类艺术创造和思想创造显得荒谬且无能为力。如此来理解德里达，其实也是欧美一大批正统哲学及“传统教育”的维护者所持有的立场——德里达被看成败坏“传统教育”的法国式的具有破坏性的知识分子的化身。讣告发表后在知识界引起一阵骚动，一批被激怒的美国知识分子纷纷出来谴责坎德尔，认为他既不懂行又不负责任。这些主要由文艺批评家、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人文学者、诗人、语言学家、剧作家、建筑设计师等组成的拥护德里达的队伍要为德里达讨回公道。当然，更多的响应给德里达以正确中肯的高度评价。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德里达逝世后评价说，因为有了德里达，法国为世界贡献了一种最伟大的哲学思想并对法国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连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这样的曾经的德里达论敌，也站出来捍卫德里达对当代思想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sup>①</sup>

毫无疑问，德里达是一个争议如此之大的思想家，对于拥戴者来说，他是一个知识无比深厚、思想博大精深的后现代启示大师；而对于反对者来说，他是一个毁坏传统以及正统观念的恶魔。如此两极形象汇集于一个人身上，前有苏格拉底，后来者就是德里达了。而德里达本人也经常谈论苏格拉底，他的名篇《柏拉图的药》（“Plato's Pharmacy”）<sup>②</sup>，一定是深有切身体会才能写下的文字。文字与毒药，谁能解其中味呢？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对所

① 参见特里·伊格尔顿：《不要嘲笑德里达》（“Don't deride Derrida”），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04年10月15日。另见康慨：《谁在作践德里达？》，《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0日。特里·伊格尔顿曾撰写《解构与人权》对解构主义进行批评，载于巴巴拉·约翰逊编《自由与释义》，纽约，1993年。1997年，他的著作《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出版（英国，布莱克韦尔出版社），其中多处对德里达进行抨击。

② 参见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rans.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有问题都思考，目光所及，几乎把从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尽收眼底。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一本书，全部打开于面前的形而上学大典。就像苏格拉底在夕阳西下时，面对那杯毒酒，他要畅怀痛饮。德里达的所有言说是药性发作后的胡言乱语，还是他已经化解了思想史赐给的毒酒？他是尼采所期望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化身吗？只有他才能带领人们走出现代性的迷宫吗？

理解德里达，不应仅仅把他看成是后结构主义的一员，后现代思想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之一，而是一个真正的开启者，一个一直指向未来的人。

## 后现代的开启者

哈贝马斯在他那本影响卓著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把尼采作为转折性的标志，认为现代思想史从尼采这里步入后现代。这是一个大胆惊人的观点。哈贝马斯指出：“随着尼采进入现代性的话语，整个讨论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理性先被当作息事宁人的自我认识，接着又被认为是积极的习得，最终还被看做补偿性的回忆，这样一来，理性就成了宗教一体化力量的替代物，并且可以依靠自身的动力克服现代性的分裂。然而，努力按照启蒙辩证法纲领设计理性概念，三次均以失败告终。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尼采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再做一次内在批判，要么彻底放弃启蒙辩证法纲领。”<sup>①</sup>哈贝马斯认为，尼采选择了后者，他放弃对理性概念再做修正，彻底告别了启蒙辩证法。

现代思想的转折从尼采这里开始，这是大多数现代思想家都认同的说法，但转向何处，何以转折则说法不同。只有哈贝马斯一下子把尼采推到一个最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中，那是从现代转向后现代的历史大转折，是告别西方已经根深蒂固的现代理性主义传统的断然绝情的做法。尼采要抛弃历史理性，去寻求理性的他者。在哈贝马斯看来，尼采1870年写下的《悲剧的诞生》一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部思古的现代性的‘迟暮之作’变

<sup>①</sup>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98-99页。

成了后现代性的‘开山之作’”。<sup>①</sup>其意义就在于尼采转向了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尼采明确地要用审美来替代哲学，世界只能被证明为审美现象。尽管德国的浪漫派，从黑格尔、谢林、费希特到施莱格尔也都尊崇艺术，都寻求把艺术审美作为哲学的最高境界，甚至在谢林那里，艺术还不只是哲学工具，更是哲学的目的，但是，浪漫派试图尽最大努力去调和迷狂的酒神和救世主基督，浪漫派的弥赛亚主义的目的是要更新西方，而非告别西方。尼采当然也一度信奉这种浪漫派的理想，从他迷恋瓦格纳的音乐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瓦格纳一直怀着浪漫派的理想，把酒神精神与基督精神调和起来，尼采后来厌弃瓦格纳正在于此。尼采要寻求的是彻底离开西方，不再试图从西方理性主义内部找到自我更新的依据。哈贝马斯认为：正是从尼采开始，现代性批判第一次不再坚持其解放内涵，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直接面对理性的他者。<sup>②</sup>这个理性的他者就是以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所展现的富有创造性激情的艺术审美世界。哈贝马斯写道：

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在两条路线上被发扬光大。怀疑主义科学家试图用人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方法来揭示权力意志的反常化、反动力量的抵抗、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兴起等等，就此而言，巴塔耶、拉康、福柯堪称是尼采的追随者；比较内行的形而上学批判者则采用一种特殊的知识，把主体哲学的形成一直追溯到前苏格拉底，就此而言，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可谓步了尼采的后尘。<sup>③</sup>

哈贝马斯这段话，堪称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刻明晰地揭示了现代向后现代转折的历史路线图，而且他也非常清晰地在巴塔耶、拉康、福柯与海德格尔、德里达之间做出了辨析区分。

意识到尼采与德国浪漫派的根本区别，以及把尼采确定为后现代的转折标志，这种观点只有哈贝马斯才能提出。因为，哈贝马斯是德国浪漫派

①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100页。

② 参见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110页。

③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113页。

的嫡系传人，他想完成的正是德国浪漫派未竟的事业，这一事业因为尼采和海德格尔而中断。在哈贝马斯所开列的尼采的两个后继路线图谱中，奇怪的是没有马克思的传人，比如本雅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哈贝马斯看来，或许这几个马克思的传人还无法在历史的主导路线上接通尼采的脉络。哈贝马斯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作为对尼采的启蒙批判的进一步激进化来解释，对于尼采来说，启蒙理性与权力的结合构成了现代性的强大压迫，因而尼采要寻求审美批判，他赞扬瞬间，颂扬动力，推崇现实性和新颖性，洋溢着对当下断裂的无限渴望。就此而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那本影响深远的《启蒙辩证法》<sup>①</sup>中，算是全盘继承了尼采的信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现代性的理性成就几乎视而不见，他们看到的是理性构成的压迫机制。在他们看来，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又变成了神话。启蒙的永恒标志是对客观化的外在自然和遭到压抑的内在自然的统治。<sup>②</sup>启蒙原来信赖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推动，但这种推动的后果却是理性的力量无限度膨胀，理性只以合目的的方式控制自然也压抑自我，理性自身的完善化就是使其成为工具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原本寄望于艺术审美可以带来对理性的纠偏，但随着资本主义娱乐工业的兴起，一切艺术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排斥，艺术也不再具有批判性的能力。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及文化现代性的批判既彻底又悲观。哈贝马斯说，在他们的批判中，理性失去了采取“肯定”立场或“否定”立场的批判能力，失去了区别有效命题和无效命题的能力，因为权力要求与有效性要求已经同流合污。<sup>③</sup>

正是因为看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未能妥善处理资产阶级理想中所确立的并被工具化了的文化现代性的合理内涵，哈贝马斯要重新接通现代理性主义的命脉。在他看来，推动科学以及科学的自我反思可以产生出不断超越技术知识革新的理论动力；法律和道德的普遍主义基础在宪政民主制度、民主意

① 《启蒙辩证法》实际上是由阿多诺的妻子格雷特·阿多诺根据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圣莫尼卡的谈话所做的笔记。全书完成于1944年，三年后由奎里多出版社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本书销量有限，出版后的二十多年一直处于脱销状态，这与它对战后德国思想界的巨大影响相比，显得很不相称。

② 参见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127页。

③ 参见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130页。

志结构以及个体主义认同模式中都可以有效地体现，尽管这种体现有时受到扭曲，也并不完整，但宪政民主程序可以不断给予纠正。另一方面，哈贝马斯与其他马克思主义传人一样，相信审美经验的创造性和冲击力，它们可以给主体性提供摆脱目的行为命令和日常知觉惯例的解放力量；这些审美经验体现在先锋派艺术作品中，体现在艺术批评话语中，在自我实现所特有的革命价值领域中发挥一定的启示功能。<sup>①</sup> 总之，基于科学、法律和道德以及审美经验三方面的现代理性的自我调节功能，可以建构起一种和谐的交往理性秩序，从而可以保障西方的现代性达到自我完善。哈贝马斯显然是调和了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他看到尼采预示的历史断裂所带来的深刻困境和尼采及其追随者所做的理性批判的不断激进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哈贝马斯也承认西方的现代理性面临巨大的难题，但克服这一难题不是尼采指引的离开西方的那条道路，也不是单纯依靠审美艺术所开辟的未来的道路，他还是要在理性自身中找到始终自我更新的力量，这是哈贝马斯难能可贵之处。他显然设想一种风险更小的、更具有社会有效性的改良主义路线，但哈贝马斯的道路是可行的吗？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无法判定哈贝马斯的方案是否更优于尼采及其追随者，但我们无疑会首先面对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哈贝马斯的影响力不及尼采的追随者？例如，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等。事实上，不管是从学识之渊博，对西方历史危机洞察之深刻，视野之深远，处理主题之重大，还是考虑问题之周密等诸多方面来看，哈贝马斯都并不输于福柯、德里达乃至于利奥塔和鲍德里亚等人，但何以在 20 世纪下半期，哈贝马斯始终没有成为一流的大师？没有成为思想启示录式的和方法论提供者式的大家呢？想想福柯、德里达等人教主式的风光，哈贝马斯的追随者却寥寥可数。哈贝马斯不得不在思想史上充当一个配角。一个企图全面修复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思想家，一个怀着以最有效的方式重新构建西方历史的人物，何以反倒落个充当配角的命运呢？与其说哈贝马斯生不逢时，不如说哈氏不识时务，用不那么世俗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找准历史介入的方向和时效。20 世纪下

<sup>①</sup> 参见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 131 页。

半叶是“破”的时代，这是尼采以来的西方历史要大破大立的时代，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生逢其时；而哈贝马斯则看到那些破绽，看到尼采时代陷入的困境（那些合法性的危机），也看到尼采的追随者们拆除得七零八落的现代性现场，但他要重新建构，他要顽强维护西方现代理性重建的可能性，他相信理性有能力自我更新，从其内部找到重新展开的机制。

就从知识理性化的层面，当代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达到哈贝马斯的那种“总体性”，也就是对从古典时代的哲学到当代给予合理性的解释的总体性，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在他的知识叙事中显现了清晰透彻的图谱。他对康德、黑格尔以来的古典形而上学，对主体性与个体性的阐释，对知识与社会理性秩序的建构，对道德、法律与宪政民主制度的关系的理解，比任何人都了如指掌。哈贝马斯深刻洞悉到 19 世纪后期以来的哲学不得不放弃注重整体认识，转向非理性这一孤注一掷的最后出路。非理性主义哲学操持了其领地与整体性的联系，但代价是放弃了其实力雄厚的认识。它们或是表现为哲学的信仰，或是表现为神秘的存在思想，或是表现为语言的治疗，或者是解构活动，或者是否定的辩证法。哈贝马斯说，这些反科学主义的规划只能解释哲学不是什么，或不能是什么。既然哲学不再认定自身是科学，也就无须确定其自身的地位。他看到这些哲学派别正确确定自身的存在根基已经不可能，只有按照各自的论证程序，才能从程序合理性的角度阐明认识活动。哈贝马斯从这里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位置和责任。在汇集了他思想认识纲领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一书中，他写道：

今天，哲学的这种尴尬处境要求我们重新确定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一旦哲学放弃第一科学和百科全书的诉求，就能保持其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而且既不是通过把自己同化到特殊的示范科学，也不是通过远离科学。哲学不得不接受经验科学的易错论式自我理解和程序合理性，哲学既不能拥有特殊的真理观，也不能拥有自己独有的方法和对象领域，甚至连一种属于自己的直观方式也不行。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在内部分工中发挥其最大效力，也就是说，才能坚持其普遍性的问题和合理重建的操作方法。这种方法依据的是有关言语、行为和

判断的主体所具有的前理论直观知识……<sup>①</sup>

哈贝马斯要离开形而上学，要哲学摆脱自以为是的超常地位，这就是他认识到哲学必然走向“后形而上学”的道路。哈贝马斯与其他所有同代大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摆脱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前提，他在所有的哲学前提底下工作，不像海德格尔要从古希腊的源头重新开始，或者像福柯和德里达那样完全是另辟蹊径，走旁门左道。他不只是在传统前提下展开知识重建，而且还要在同代人的合理性的知识语境中展开积极的建设性的对话。这就像他的思想核心“交往理性”一样，他的学术话语就是一种交往理性的对话。他的理论设计无疑是当代所有思想范式中最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他设想：“在日常交往实践的有效范围内，出现了一种跨越多种层面的交往理性。这种交往理性同时还为彻底被扭曲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准绳。这些被扭曲的交往和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对在向现代性过渡过程中所获得的理性潜能有选择地加以充分利用。”<sup>②</sup>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最突出的传人之一，哈贝马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他相信，随着形而上学和宗教世界的瓦解，从具有多方面价值的文化解释系统中所分化出来的一切，在生活世界的实践经验中还能组合起来，并恢复原有秩序。

当代思想界没有人像哈贝马斯这样清醒和清楚地知道哲学的历史发生了什么，现实和未来的可能性在哪里。他知道自己处在何处，知道他的责任和目标。但是，哈贝马斯就是激不起知识界的热情，他的批判性不够彻底，不够颠覆性，不够陌生化和具有开创性。他不是走在历史转折的前面，他只是在整个西方理性时代的后面，他是西方理性主义事业和德国浪漫派最后的继承人，最后的重建者。在这一意义上，在大师级的思想家开辟道路这一意义上，他反倒是孤军奋战，落落寡合，应者寥寥，他是一个为现代理性虔诚献祭的殉道者。

哈贝马斯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但他回天无力，虽然我们也无法判定现

<sup>①</sup> 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36-37页。

<sup>②</sup> 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第49页。